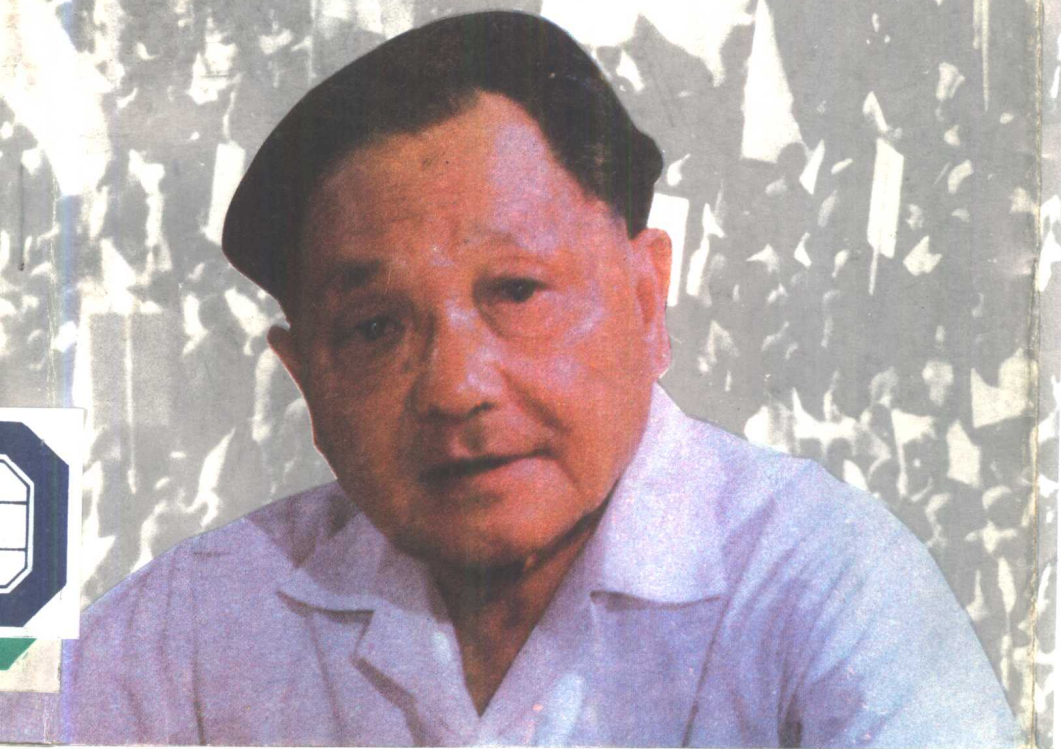


纪实小说《崛起》之三

# 邓小平 在1976

怀仁堂事变

青野 方雷 /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邓小平在1976年

# 邓小平 在1976

怀仁堂事案



# 邓小平 在1976

● 下卷 / 怀仁堂事变

青野·方雷 /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 1993年 / 沈阳

邓小平在 1976  
Dengxiaoping zai yijiuqiliu  
青野方雷 著

---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480,000 开本:850×1168<sup>1</sup>/<sub>32</sub> 印张:19<sup>1</sup>/<sub>2</sub>  
1993 年 3 月 1 版 199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0

---

责任编辑:安波舜 责任校对:范程  
封面设计:耿志远

---

ISBN 7-5313-0943-2/I·860

---

定价:13.40 元

纪实小说《崛起》之三●

# 下卷

## 怀仁堂事变

---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在他尚未冷硬的遗体旁，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紧急会议。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九月九日。“九”在中华民族古老的历史中被认为是“阳”数，九月九日这天，恰好月和日都逢九，两个“阳数”重叠，故称“重阳节”。相传东汉时期，有一个叫桓景的人跟随一个叫费长房的人到外面去游学。一天费长房突然对桓景说：“九月九日，你家有灾难。”桓景求教避灾之法。费长房便将秘诀写于纸上交他。桓景回到家中，按照“秘诀”叫家里人缝制了许多香囊、装满茱萸，佩戴在身上。到了重阳这一天，桓景又按费长房所说的带着家人去登高，每人胳膊上都系着茱萸香囊，还在山上喝了菊花酒。等到天黑回到家中一看，发现家中的牛羊鸡犬全都死光了。桓景把这事告诉了费长房，费长房说：“阎王命鬼神来索取你全家人的性命，被你用秘语躲过，他们只好把你家中牛羊鸡犬的魂儿勾去。”后来，人们也称“九月九日”为“鬼节”，到这一天为避灾消难都佩戴茱萸登高。一九二九年，毛泽东曾填写过一首词，名叫《采桑子·重阳》：“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

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四十七年后，就在这个凝聚着中华民族悠悠历史风骨的重阳节的寂寂深夜，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却躺在古老而神秘的中南海内，一间幽暗而简朴的卧室里与世长辞了。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巧合。

照耀在八亿中国人民头上的太阳轰然陨落了。这个不寻常的夜晚因而显得越发不寻常。

噩耗震惊了中华大地，震惊了整个世界。

虽然毛泽东已是八十三岁高龄的耄耋老人，但这对于整日高呼“万万岁”的中国人来说，“八十三”毕竟显得太微小了。尽管毛泽东已重病缠身七、八年之久，但中南海高大、鲜红的宫墙把他的病情变成了特级国家机密。不要说普通百姓，即使是党的高级干部也无法得悉毛泽东的真实状况。他们只能从文件上或报刊上得到他至高无上的指示和讲话；他们只能从电视上或照片上看到他慈祥的面容和魁伟的身躯；他们只知道他办公室的灯光彻夜不熄，他天天在为国家和人民辛勤操劳，他身体非常、非常地健康。

尽管中共中央对毛泽东的病情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但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还是越过中南海的高墙传到了社会上。尤其是四月三十日，毛泽东在凌乱的书房会见了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和自己新选拔的总理华国锋，当他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时，一反往常那种满面红光、神采奕奕的神态，显得目光呆滞、面容苍老、臃肿的躯体无力地躺靠在大沙发上，微微张合的嘴巴艰难地翕动着，连女秘书为他擦拭嘴角口涎的镜头竟然也没剪掉。电视台如此宣传毛泽东的形象还是破天荒第一次。这不知是中央机构有意的布置呢？还是宣传部门无意的泄密？但对毛泽东这次会见外宾的报道，确实在全国引起一阵剧烈的猜测和不安。这无疑对四个多月后毛泽东的逝世是一次极好的铺垫和预告。这也又



一次显示了毛泽东作为一名最高统帅非凡的远见和超人的毅力，在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会见外宾的时候，他留给自己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三句话：“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后来被称为“毛主席临终嘱咐”的这三句话，对“四人帮”的覆灭，对确立华国锋的领袖地位，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即使在生命旅途的最后时刻，他仍在为巩固和显示自己的权力而不懈地拼搏；他仍像一位不屈的舵手，牢牢控制着整个国家的航舵。这一点，我们可以断言他至死都深信不疑。在几十年风风雨雨、惊心动魄的权力角逐中，有多少人曾想把他推下领袖的宝座，取而代之，结果一个个都身败名裂，跪倒在他的脚下，成为举国唾弃的罪人，而他的领袖地位却越来越牢固，越来越夺目，以至达到了登峰造极、至高无上的地步。“我死后，不管是左派上台，还是右派上台，他们都会打着我的旗号。”十年前他在南方一个山洞里给夫人江青写信时曾这样预言。而他逝世后的历史似乎正在证实着他的这个预言。在中国，即使毛泽东的生命结束了，但他的威严，他的思想，他的名字，仍将像阳光一样照耀着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培育出一代又一代新的生命。

在这个不寻常的夜晚，第一个发现毛泽东溘然逝去的是他年轻的女秘书张玉凤。当时，她正守候在床边。隐隐听见不远处西单电报大楼顶端的巨钟传来几声沉闷的钟声，已是午夜零点了，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夜沉更深，万籁俱寂，抬眼望去，透过窗帷缝隙可见茫茫苍穹一轮明晃晃的圆月，几丝残云掠过，越显显得风影孤单，月色惨淡。她倏然记起今天是九月九日，也隐约想起毛泽东曾不只一次地讲过：这是个令他终生难忘的日子，四十九年前的今天，三十四岁的毛泽东在家乡率领数万农民举行暴动，从此，他走上了一条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并终于开创一代

江山，成为一代伟人。就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就是这支农民武装为他的丰功伟业奠定了坚实的根基。可四十九年后的九月九日，他却静静地躺在病床上，无可奈何地等候着死神悄悄地来临。此刻，张玉凤似乎已听见死神走近的脚步声，她紧张地注视着毛泽东那张毫无血色，也毫无表情的面孔，倾听着从粗大的鼻孔中传出的一丝微弱的呼吸。忽然，她看见毛泽东紧闭了三天三夜的双眼蓦地睁开了，两只昏黄、凝滞的眸子又迸闪着一点像萤火般飘忽不定的亮光，切切地盯着她，粗大的喉结艰难地上下滚动着，微微张合的嘴巴发出一阵嘶哑急促的声响，他好像有什么话要向女秘书讲。张玉凤忙探过身，将耳朵紧紧贴在毛泽东的嘴边。如果这个时候毛泽东真能留下只言片语，那将是名符其实、永载史册的“临终嘱托”，那对他的党、国家和人民都将是莫大的慰藉和无与伦比的财富。但不管张玉凤如何急切地等待，他那大张的嘴巴除了发出“嚅嚅”的喘吁外却始终未能吐出一个字。也许他此时真想对女秘书说些什么，也许他根本就什么也不想说了。在他辉煌壮丽的一生中，他已经说得太多了，政治的、军事的、哲学的、经济的、文学的……凡人类思维触及的地方他几乎都说到了。在这弥留之际的一瞬间，他可能感到孤单，感到恐惶，感到依恋，他紧紧抓住女秘书温柔的手，仿佛坠下悬崖的人抓住一棵细藤；又仿佛要带着她一同离开这座古老的星球飞向那片冥冥世界。

据张玉凤后来回忆：毛泽东死得平静而安详，他的手攥得格外有力，大睁着两眼望了她一下，便收了一丝游气。就像一盏熬干油的灯，没有任何风吹气摇，便“噗”地熄灭了生命之火。

当张玉凤意识到面前这位日夜相伴的伟人已变成一具没有生命的肉体时，她并没表现出丝毫惊慌和哀痛，相反，她的神情却显得异常镇定，好像她几天来一直守候在这里就是为了等待

这个死亡时刻的到来。她缓缓地站起身，将自己的一只手从毛泽东有些僵硬的大手中用力抽出，转身走出卧室。

等候在书房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华国锋、王洪文和中央警卫团团长汪东兴“唿”地站起身，将不安的目光一起投向面容冷峻的女秘书：“怎么样？”

张玉凤语气木讷地说：“他已经走了。”

三个人闻声疾步冲进卧室。

几名裹着白晃晃罩衣的医生正在手忙脚乱地抢救，试图让毛泽东的心脏重新跳动。但每一个在场的人都明白：这只不过是一种徒劳的形式。

几分钟后，氧气罩摘掉了，心电图示波监护器关闭了，一切抢救工作便都停止了。有人将一张《死亡诊断书》递到华国锋面前，他看了看，匆匆签了字。

王洪文喊了声“主席呵！”便“咕咚”跪倒在床前，禁不住失声痛哭。顿时，呜咽声、抽泣声，响成一片。

不一刻，住在一侧的江青也闻讯赶来，据姚文元在一次审讯中交待：她头发散乱，神色慌张，进门便扑在主席遗体上一面痛哭，一面呼喊：“医生呵！你们快救救主席呵！你们为什么不救救他呀！”嗓子都哭喊哑了，仍不肯离去。其悲痛之状，催人泪下。应该说，姚文元的这段讲述是可信的，因不论从夫妻之情，还是从政治利益，毛泽东的逝世对江青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她岂能不伤心至极，悲痛欲绝。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印发的《“四人帮”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曾登载了江青的警卫员周金铭和毛泽东医疗小组十一名保健医生联名写的揭发材料，证明：“反党分子江青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怀有刻骨仇恨。……每次毛主席治病，江青都一再干扰破坏。毛主席逝世时，我们都很悲痛，江青却说：‘你

们不要愁眉苦脸啦,看我现在就很高兴。’……”这种揭发材料,与人与事,与情与理,似乎都有些牵强。还有一种说法:即毛泽东是因江青迫害致死的。在中共中央文件中公布的上述十一名医生的联名揭发材料中就这样写道:“九月八日,江青一定要(给)主席翻身,医护人员坚决说不能翻,翻了危险。江青硬要给主席翻身,结果翻身后主席额面青紫,血压上升。江青一看情况不好,扬长而去。”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四日,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在给审查“四人帮”专案小组写的证明材料中也说:“九月八日凌晨,江青要给主席翻身,医务人员根据主席病情,不同意翻身,江青坚持要翻。值班医生在 202 大厅请示正在值班的王洪文、汪东兴,他们到主席病床前,说:可以翻身。结果,翻身后,主席额面青紫,血压上升,就不行了。”如果把这些作为江青、王洪文仇恨、迫害毛泽东的罪证,显然是不客观,也是不公正的。

当时,面对毛泽东渐渐冷却的遗体,不管是后来成为胜利者的华国锋和汪东兴,还是一个月后沦为阶下囚的王洪文和江青,都毫不掩饰地用泪水表达着自己深沉的哀痛。尤其是华国锋,极度的悲伤竟使他显得有些慌然不知所措,只顾站在床前垂头呜咽。相形之下,跟随毛泽东数十年的汪东兴倒表现得镇静而有节制。洒罢几滴眼泪,他便恢复了平素那种稳健、果断的气度。指挥工作人员给毛泽东净身更衣;布置医疗小组赶写死亡报告;随后又逐一打电话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立即到中南海“游泳池”召开紧急会议。

一时四十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全部赶到游泳池被称作“202”室的会客厅。

哭红双眼的华国锋首先向委员们宣读了医疗小组起草的死亡报告。

虽然毛泽东早在数月前就已不能进食,神志模糊;虽然毛泽

东早在八月十四日就把政治局委员全部叫到床前，一一作了诀别；虽然政治局早在十多天前就得到毛泽东病危的通知，并责成姚文元、纪登奎准备悼词和讣告；虽然八十三岁高龄的毛泽东的寿终正寝早在预料之中，筹措及时，但当这一事实果真发生时，无限忠于自己领袖的委员们仍感到撕心裂胆地震惊和悲痛，以至惶恐无措，坐立不安，似乎天要塌，地要陷，人类从此要完结。

主持会议的华国锋仍然沉浸在极度的哀伤中。直到此刻，他还不明白这次会议的具体议程是什么，自己身为第一副主席应该做些什么，他只一味地哽咽着、用充满感情的语调喋喋不休地讲叙着毛泽东对自己的教诲。在他的示范下，有几位委员也流着眼泪回忆起伟大领袖的恩泽。说到动情处，个个泣不成声。政治局紧急会议不时被凄婉悲恸的哭声所打断。

当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以农民的方式，一面粗声呜咽着一面深情地赞颂着毛泽东为中国农民所谋创的幸福时，国防部长、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挥手打断他的发言，神情漠然地对华国锋说：“时间不早了，我们还是议一议治丧的事吧。”

政治局常委张春桥随即附和道：“对，应该先讨论一下《告人民书》，今天必须发出去。”没等华国锋表态，他冲坐在一侧的姚文元冷冷地吩咐道：“文元同志，你把《告人民书》给大家念一念。”

姚文元点头应诺，摘下眼镜，用手帕擦擦泪眼，声音沙哑地将亲笔起草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念了一遍。

这份由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四家最高统帅机构联合颁发的讣告，用一连串金光闪闪的词句高度评价概括了毛泽东伟大光辉的一生。

“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英明领袖。”

“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中国人民的一切胜利，都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主席为中国人民，为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立下的丰功伟绩是永存的。”

《告人民书》在热情赞颂的“丰功伟绩”中，第一条就是“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长期尖锐复杂的斗争，战胜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的机会主义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战胜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虽然这里列举的被毛泽东战胜的反革命头子大部分在他逝世后不久都平反昭雪，又变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家”，但这并不能诋毁和削弱毛泽东作为一名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和最高统治者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即使今天的人们重读这篇《告人民书》，仍会认为毛泽东对这些赞美之词是受之无愧的。

姚文元念得很缓慢，也很有感情，尽管这份《告人民书》几天前就已写好，其中每一句言词，每一个段落，他都经过反复推敲，熟记能诵，但此时读来仍不免哀肠欲断，潸然泪下。有几次他不得不停下来擦擦眼泪，稳稳情绪。当他把三千多字的《告人民书》读完时，大厅里一片沉静。委员们对这篇文献性的诘告似乎很满意，没有人提出异议和补充。

华国锋目光滞缓地扫视着会场，又等了片刻，见确无人吭声，便宣布通过。

这时，江青却怒冲冲站起来表示反对：“不行！这个告人民书写得不好！”她盛气凌人地挥动着一只手臂，语气武断而嘶哑地

喊着，“这上头为什么不写批林批孔？为什么不写批判邓小平？是不是主席死了，要给邓小平翻案了？”

姚文元尴尬地咧咧嘴，欲言又止。

王洪文抬起哭红的眼睛横了她一下，不满地顶撞道：“你有意见可以提，不要乱扣帽子。”

江青脖子一拧，竖起双眉厉声道：“我这话不是冲文元讲的。在座的有些人嘴上不说，心里就是这样想的。”此时，她的神态出人意外地显得非常平静，平静得仿佛什么也没发生一般，镜片后两只明亮、端丽的眸子里没有一点泪光，也没有一丝悲哀，仍和往常一样迸闪着那种冷漠、威严、咄咄逼人的目光。她习惯地拢了拢短发，用不容置辩的口气说：“我建议，在《告人民书》中要写上‘批判邓小平，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这句话，要宣布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不然今后总有人会把他抬出来。”

张春桥语气低沉地接话道：“江青同志的意见是对的，在《告人民书》上应该有批邓的内容。”

有几位委员也马上表示赞同。

江青脸上掠过一丝难以掩饰的自得。扭头对姚文元吩咐道：“文元同志，你现在就把我讲的这一条加上去。”

姚文元没作声，将征询的目光投向并排坐着的华国锋、王洪文和叶剑英。

王洪文有些不耐烦地又挥挥手：“加上吧，加上吧，《告人民书》就这样定了。”

叶剑英掏出手帕擦了擦昏花的泪眼，探起身慢悠悠地说：“我也同意江青同志的提议，在《告人民书》上要加上‘深入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样的条款。不过，关于邓小平的党籍，主席已经定了，就不要变了吧。”

王洪文也跟着补上一句：“对，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也得等

召开三中全会。”

江青脑袋一扬，拔高声音喊道：“政治局就有这个权力，当年开除刘少奇、安子文的党籍，就是政治局定的。这一点，春桥可以作证。”

张春桥面孔阴郁地点点头：“是的，政治局是全党的核心，当然有权作出这样的决定。不要说邓小平，就是副主席、常委如果违反主席的路线，搞修正主义，政治局也有权把他清除出党。但剑英同志讲得也有道理，邓小平的党籍是主席定的，还是先不要变动为好。”

江青怒冲冲地质问道：“现在主席死了，难道这个决定就永远不能变吗？”

汪东兴口吻严厉地反驳道：“你这叫什么话，主席是去世了，可他的思想和路线还在，这永远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指南。这一条就是再过一万年也不能变。”

张春桥也加重语气赞同道：“对，这一条也要写在《告人民书》上：我们一定要继承主席的遗志，要永远坚定不移地执行主席的思想和路线，要永远忠诚和勇敢地捍卫主席的形象和旗帜。”

华国锋神情激动地连连点头：“好！好！中央很有必要为此作一个决定：凡是主席决定的事我们永远不能改变，凡是主席讲过的话我们永远都要照办。”

第一副主席的这项提议，得到全体委员的一致拥护。

江青见自己的“提议”未被通过，很是恼火，可又不好发作，便借口要亲自给主席净身穿衣，悻悻离去。

她在二十天后，即十月一日在清华大学的讲话中还不无怨愤地提到这件事：“我在主席逝世后的第一次中央会上，就控诉了邓小平，要开除他的党籍。可那些人不同意，没有开除，还要以



观后效，我看还会有人要为他翻案。”五天以后发生在怀仁堂的事件，便证明她的这个预感和预言都是正确的。如此推论，在九月九日深夜的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她似乎就有这种紧迫感和危机感。她之所以别出心裁地提出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一方面表明她内心对邓小平的仇怨甚深，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另一方面她也想借机试探一下自己在政治局的地位和权威，是否随着毛泽东的逝去而减弱或受到威胁。“主席死了，别看他们表面哭，心里都在幸灾乐祸，用不了多久就会对我下毒手的。”在那个凄风惨月的夜晚，她一面给毛泽东渐渐僵硬的遗体换衣，一面语调悲哀地对张玉凤等几位工作人员诉说着心中的愤慨和忧虑。事后，有人写文章揭发她中途退会，是跑到毛泽东的卧室搜翻保险柜的钥匙，企图盗窃篡改党的核心文件。这一谴责真假如何？难以断论。据一位在“游泳池”侍奉毛泽东多年的服务员讲，自一九七二年毛泽东生病以后，他便将十多只存放机密文件的保险柜的钥匙交给张玉凤保管。这一点江青自然清楚。所以她即便是想得到保险柜的钥匙，也用不着到毛泽东的衣兜和床上去翻找，她可以向张玉凤索要，她也确实找张玉凤要过，但没要到，因为在毛泽东逝世几天前，当他已神志不清，奄奄一息时，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就毫不客气地从张玉凤手中接管了毛泽东的所有钥匙。就是说：毛泽东多年搜集掌握的大量档案文件随着他生命的结束全部移落到汪东兴手中。江青对此当然不满，她确实找汪东兴吵闹过，但大树已倒，今非昔比，闹也无济于事。

当江青给毛泽东净身穿衣时，在“202”室的政治局会议仍在继续进行。会议在肃穆悲哀的气氛中通过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通过了“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通过了在全国举行各种悼念仪式的公告；通过了中央军委发布的陆、海、空三军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的命令；通过了中共中央发给各省委、自